城市“打卡”，看地标不如逛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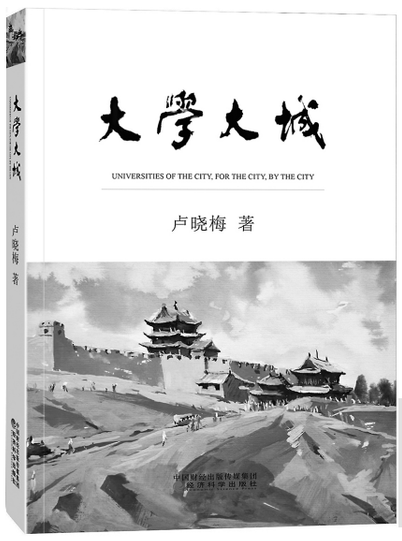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温才妃

用卢晓梅的话说，自己是“一只好奇心重的蚂蚁”，喜欢读书，喜欢行走，喜欢看长河落日和苍茫大地。她走过、路过世界百多个城市，每到一处必到当地大学打卡，不畏辛苦，几近偏执。

她从小生活在位于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家属院，之后求学、任教，辗转在复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目前在南京工业大学柔性电子（未来技术）学院担任教授。体验和记录大学仿佛成为了她生来的使命。

“观察一座城市的风格，最直接的就是看大学。因为大学是城市的‘会客厅’，也是城市人文历史和学术传承的见证物。”卢晓梅说。

2015 年在美国访学，卢晓梅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积累素材，陆续写了上百万字，浓缩其精华，出版了《大学大城》一书。全书共 4 篇，审视古今中外大学与城市的共荣共生、流变演进，冷静研判利弊瓶颈，力图解决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



《大学大城》，卢晓梅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2 年 11 月出版，定价：81 元

大学与城市并非生来就相濡以沫、双向奔赴。二者之间经历了从对抗到欢迎的态度转变。

国外大学看“颜值”

走在国外的大学校园中，卢晓梅仿佛穿梭在一部大学与城市的发展史当中。这样的感觉在书中进行了描摹。

“不同时代建造的校园，镌刻着特定时期的痕迹。可以从建筑上大致判断出大学的办学史、培养人才的主要类型，甚至可以推断出所在城市的产业结构特点。”卢晓梅说。

如果大学是用石材构筑的，有着高耸的教堂和钟楼、精美的穹顶和雕塑，那么这美轮美奂的古典主义建筑背后，往往和宗教或者王权相关。

最经典莫过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许多住宿学院依旧保持着传统的中世纪僧院风格，置身其中仿佛在《哈利·波特》或《唐顿庄园》等影视剧的片场。

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在很大程度上也继承了中世纪学院风格，让大家吃住学聊在一起，以传统而昂贵的博雅教育模式培养最顶尖人才。

如果建筑主体用砖块建成，那么这所大学通常是工业革命之后，在主要工业城市建造的。英国把这一类创建于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学，定义为“红砖大学”，包括伯明翰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这些学校有很强的工程技术和应用学科背景，擅长分门别类地培养实用型人才。

玻璃大学则是二战后设立的大学。多由混凝土加平板玻璃等新型材料构筑，建造快捷且节约成本，设计风格上更加丰富多变，可以借机表达新的理念主张，具有文化先锋的含义。

这类大学包括了各种短期大学、师范学院、城市大学和社区学院，其培养目标是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大学普及化相匹配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更强，以满足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要。

中国大学看设计风格

同样的观察转换到中国大学，卢晓梅发现，“中国大学校园要从外观上判断其始建年代，关键看它的设计风格”。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她介绍了中国大学校园风貌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 1952 年院系调整为里程碑，此前中国大学建筑有统一的外形符号——古代殿堂式的屋顶。飞檐翘角是我国古建筑最具表现力的建筑符号。卢晓梅将这类大学称为“飞檐大学”。主要有三类：洋务运动后由官办或传统书院改造的学校、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以及私人办的学校。

第二阶段，从 1952 年起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特征是气派的行政主楼和宏大的入口广场，可以简称为“苏式大学”。

上世纪 50 年代，全国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结束，学院建制不复存在，中国高教体系按照专业重构，成立了一批行业性大学。按照行业属性，这些大学紧密嵌入城市产业分工格局中，并在校内设立了大量的生产劳动单元。在计划经济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总基调下，大学与城市的距离拉近了，城市和城市的差异缩小了。

以苏联莫斯科大学主楼为模板的“斯大林式建筑”，好似巨大的生日蛋糕，追求气势磅礴、高耸雄伟，彰显了革命激情与民族自豪感，这种建筑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和大学进行了不同比例的复刻。

毛主席雕像、镶边式建筑组团，以及后来为了厉行节约发展出来的一字形预制板单元楼，按照同样的设计图纸，像火柴盒一样排布在不同的城市和大学中，承载着几代人的热血青春。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 2000 年前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发展的快车道。大学急剧扩招，新大学、新校区和新大学城不断涌现。大学在城市外缘中不断蔓延，成为城市化扩张的急先锋。

欧美有一类“绿地大学”，恰好与这段时间的中国新建大学特征吻合。它们为超过半数的国民提供了获得新知的场所，往往设在城市边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自由规划、自由生长，并在经年累月中把乡间点化成了城市。

尽管高校不断提倡特色化办学，但体现在建筑上反而少有特色。卢晓梅走过许多新校园发现，因土地审批和规划地块等因素，这些校园普遍采用了环线式、生态型、大尺度、学科群组团的设计风格，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校园形态。圈层和环线的中心多为湖泊、广场、人工景观等。图书馆等人流和信息流密集的公共建筑，逐渐代替行政主楼成为校园空间的重心。

由于信息比以往畅通，新学校往往会模仿那些口碑较好的大学校园，导致新建校园千篇一律。

融入城市烟火气

1998 年，卢晓梅在复旦大学求学。有一位女同学是上海黄浦区人，学校所在杨浦区五角场，被同学父母认为与乡间无异，哀叹“乡下的野风把女儿的脸吹粗糙了”。五角场的城市化历程体现了大学与城市的正和博弈，这一幕被她写入书中。

2000 年左右，复旦大学的围墙全部被拆除，改成了铁栏杆。“当时我们有点不适应，大学应该是高墙里的象牙塔，怎么突然透绿了？”卢晓梅回忆道。

“现在想来，复旦还是有先见之明。创新最重要的是包容和开放。包容性来自多样性，学校里有不同学科门类、不同学术背景的人群，鼓励异质文化竞争与合作，可以丰富创见。开放性可以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让系统保持生机活力。”卢晓梅如是说。

在她看来，开放首先是校门要开放，物理上的交换。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讲堂、剧场甚至实验室都可以对市民开放，赋予城市轻盈、文雅的气质。

卢晓梅做的是高分子材料研究，她用化工术语打了个比方。化工过程，首先要物质传递，在此前提下才会有动量传递和能量传递。

同理，“城市与大学的互动，要从接触和了解做起，然后才会有化学反应”。卢晓梅认为，破除有形的大学围墙和门禁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破除人们心灵世界的隔阂。

书中主打的一个观点是，大学要“为城而址”“为城而事”“为城而治”。但事实上，大学与城市并非生来就相濡以沫、双向奔赴。二者之间经历了从对抗到欢迎的态度转变。

因为隔阂的存在，中世纪的牛津大学师生和所在的牛津城还曾发生“市民与学人”“城镇与学袍”之间的流血冲突。后来的大学逐渐在城市生长、扎根，从摩擦冲突走向了良好互动。很多城市因大学而兴，甚至城市就是大学。

“大学必须要融入城市的烟火气。”卢晓梅说，把大学过于神圣化，不顺应世情并不是一件得意的事。

2016 年，卢晓梅在谢菲尔德大学参加毕业典礼。女王派了装扮华丽、头戴假发、足后银钩的特使前来祝贺，整场毕业典礼就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演出。“我在赞叹一所高校注重品牌建设的同时，不禁思考英国高等教育的过往。”

正是保守主义深植，英国高等教育长期不愿意改变。18 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依旧坚持将学生培养成绅士的定位，漠视当时针对中下层的科学教育。这才给了德国大学“可乘之机”，随着 19 世纪工业革命推进，德国吸取英国的教训，为科学找到了栖息之地，最终成为了世界科学中心。而 20 世纪的美国集实用主义之大成，让科学走出神龛，让大学融入城市烟火，以“黄油和枪炮”为使命，服务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如此反思耐人寻味。正如她自己的调侃，看这本书犹如“吃火锅”。凡有关大学与城市的话题，读者都能在书中寻觅到超乎寻常的“美味”。

霍金最后的理论思考

■林群

作为一个常年在我国科普工作一线奔走的“退休老人”，史蒂芬·霍金是我在多个场合和多次采访中都会提到的科学家，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敬佩的物理学家。

霍金的贡献不仅在于物理学领域，更在于公众范围的科学传播。霍金著述颇丰，除了家喻户晓、几乎在每个欧洲家庭的书架上都有的《时间简史》外，他在科研的同时还出版了《果壳中的宇宙》《霍金讲演录——黑洞、婴儿宇宙及其他》《大设计》等作品。2018 年 3 月，霍金去世后，依然有《十问：霍金沉思录》问世。

而这本《时间起源》的作者本来也应当写上史蒂芬·霍金的名字。比利时鲁汶大学物理学家托马斯·赫托格自跟随霍金读博士起，就成了霍金合作密切的学术伙伴。他是霍金的弟子，是霍金的同事，也是霍金的朋友。在这本书里，赫托格详细地阐述了霍金生前最后关于时间起源的理论思考。

自上而下的宇宙学的发展，是霍金与赫托格的合作中最有张力也最富有成果的阶段。曾经参与撰写《大设计》部分书稿内容的赫托格，在霍金去世后明白，自己要独立承担起向这个世界系统性地展示霍金最后的理论的工作了。霍金最后的理论是自上而下的宇宙学观念，是晚年霍金对于早期自己——写作《时间简史》那个时候秉持自下而上观点的颠覆。

这本书中，除了理论上的详尽阐释外，更有两人合作细节的娓娓道来。霍金特殊的身体情况和沟通方式世人皆知，而在赫托格细致的回忆下，我们能够看到，在这样的不便下，一位科学巨人是如何以其对科学的热爱做出了不凡的事业的。霍金的风趣幽默、活跃与好奇，全都跃然纸上。

科普教育需要科学家，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向大众普及科学的重任。他们能使真理露出海面，还能把原创性的东西告诉大众。科普对科学家本人亦有益，它能使科学家更好地消化和理解自身的专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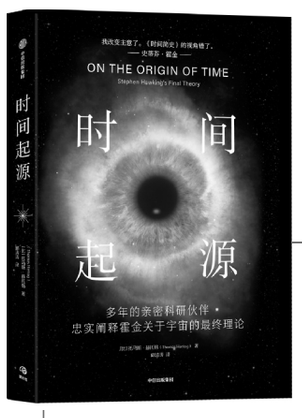
不仅如此，科普教育也依赖大科学家。数学家华罗庚当年作讲座，全国有百万人在听，而我作讲座就只有几十个人听，这就是差距。同时，大科学家对问题的理解最透彻，他们能以最浅显易懂的方式把知识传授给公众。比如霍金当年在撰写《时间简史》时，就非常注重如何在尽量不引入公式的情况下让公众明白其中的概念。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长久以来，致力于科普教育的科学家并不多，这可能是受了“从事科普是不务正业、没有创新性、科研搞不下去了才去做科普”等观念的影响，近年来情况才稍有好转。事实上，科普与创新不但不矛盾，还能相互促进，霍金就证明了这一点。

《时间起源》是霍金最后的理论，和《时间简史》构成了呼应，仅仅从书名结构上就能看出来，《时间起源》回到了最终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时间简史》的致敬。用赫托格的话来说，霍金是一个渴望我们所有人都能更多地从宇宙的角度看待我们的存在，并从深层次的角度思考问题的人。

这不仅是一本关于宇宙学的科普图书，更是让我们得以一窥伟大科学家最后的精神世界的佳作，推荐给对宇宙怀有好奇的每一个人。

（本文系《时间起源》序言，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标题为编者所加）



《时间起源》，[比利时]托马斯·赫托格著，邱涛涛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3 年 10 月出版，定价：90 元

药品监管的法治落在何处

■本报记者 陈祎琪

“作者将药学专业能力、法学研究思维和药品监管实践有机结合，不可多得的交叉复合型知识背景为该丛书带来了独特视角和语言魅力。”中国药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邵蓉如此评价由宋华琳等撰写的“药品监管法治丛书”。

作者宋华琳是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深耕药品法领域二十八载，研究药品监管 10 余年，丛书共分为《药品监管制度的法律改革》《药品管理立法比较研究》《药物创新立法比较研究》3 册，针对中国药品安全、药品监管中的现实问题，在借鉴国外药品监管法制建设经验的同时，梳理了我国监管制度流变，提出对未来制度的改革展望。

探索中国式药品监管法律制度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是镶嵌于社会复杂玲珑棋局之上的落子，都是诸多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因素相互制约与作用下的产物，是以一个个动态事件链条为基础的“活的”社会系统。

“希望对药品监管制度改革提出理论探讨和务实建议，厘清短板，摆脱路径依赖，探索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发展需要的药品监管法律制度。”这是宋华琳撰写《药品监管制度的法律改革》一书的初衷。

何为监管？中外学者众说纷纭。宋华琳认为，监管的核心含义在于指导或调整行为活动，以实现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

本书中宋华琳尝试引入分析叙事的手法，利用年鉴、公报、法律汇编、史料集等药品监管制度史料，融合行政法学、政府监管、公共治理理论和药品监管实践，以法律与社会的互动、法律的实际效果为锚点，以中国药品监管制度的现实法律图景为基点，梳理并审视药品审评、药品标准、药品认证、药品检查的制度演变，并对相关法律制度问题加以研究。

“不仅展示‘纸面上的法’，也展示‘行动中的法’，从中或可管窥我国药品管理筚路蓝缕之艰、监管型国家建构之难，梳理出从管理到监管、从监管向治理转型的法治历程。”宋华琳说。

在我国药品监管法治建设过程中，外国法与比较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华琳表示，“域外法律制度设计虽非决定性因素，但构成了重要的参考系，成为我国药品监管制度设计者必须考虑的补充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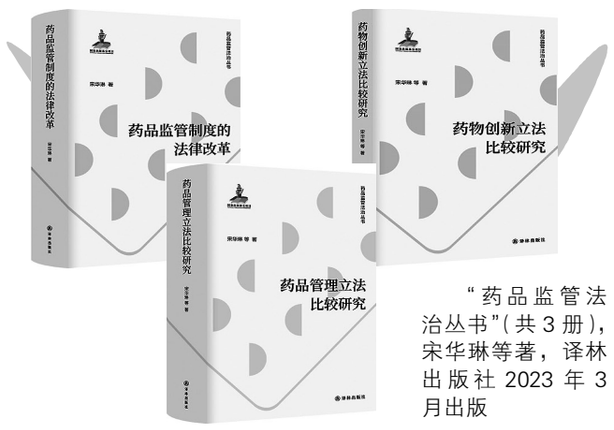
要比较“立法”研究，更要理解“活法”

法国比较法学家达维德曾说：“在所有学科中，只有法学错误地认为可以成为纯粹民族性的东西。神学家、医学家、科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以自己不了解国外在本专业领域内取得的进步而感到耻辱，但只有法学家将自己封闭在本国法的研究中。”

日本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也曾指出，一个比较研究数国法的愚人，有时会比满足于一国法研究的智者获得更胜一筹的认识。因此，比较法也被视为“真理的学校”或“解决问题的仓库”。

《药品管理立法比较研究》一书中梳理了域外典型国家和地区的药品监管法律制度，探求各国药品立法中的共性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比如，英国有完善的许可程序和广告监管细则；德国的《药品法》细化了监管程序，增强了药品法的可操作性与适用的灵活性；美国药品监管制度经过百年发展，建立起科学、高效、系统、全面的监督规范体系；新加坡重视监管信息化建设，形成了全环节、一体化、综合性的智慧监管体系，等等。



“药品监管法治丛书”（共 3 册），宋华琳等著，译林出版社 2023 年 3 月出版

“我国现阶段的比较行政法研究不是‘过剩’而是‘不足’。如果不加以重视，纵使对中国行政法实践再进行‘深描’，之后的分析和解释仍可能缺少学术厚度。”宋华琳表示，比较法研究不仅仅是比较“立法”研究，还应在社会生活中理解其“活法”，谨防“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坚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慎言“拿来”。

宋华琳进而表示，本书仅仅是对比较行政法的静态研究，未来会更关注各国政府监管法律制度背后的政策环境、产业形态、历史文化、社会心理，以及各国政府监管法律制度的运行实效，开展动态的比较行政法研究。

药物创新环境向好

“如何以立法推动药物创新，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论题，涉及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等多学科知识，也涉及药事管理、卫生管理、医疗保障等更为广袤的领域。”宋华琳在《药物创新立法比较研究》一书中说道。

当下，我国药物创新环境不断向好。随着医药市场的国际重心转移和国内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渐成为新的创新热土，国际合作机会也进一步增多。同时，“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让全国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应充分把握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综合运用各类治理工具，以药物的研发、审批、上市后风险管理以及相关配套机制为切入点，为创新提供激励与机遇。”宋华琳表示，只有做好顶层立法设计，才能真正对药物创新起到激励作用。

书中对创新药物定价的立法、基本药物制度的改进以及医疗保险制度的改进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此外，宋华琳认为，还要完善药品上市后的监管体系，“对于新药而言，上市后监管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新药的用药安全，发挥预期效用，并为未来的药物研发提供经验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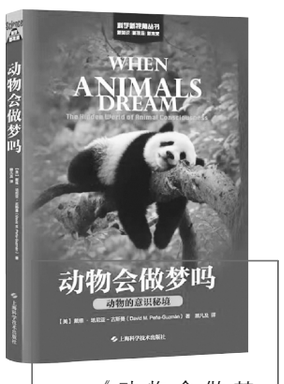
虽然药品监管的法治征途没有终点，但本丛书从宏伟蓝图到微观研究、从中国发展到域外经验，深入探索了我国药品监管法治的发展流变、问题症结和破解路径，无疑对我国药品监管法制改革极具参考价值。

荐书

▶《报国》，郭曰方著，杨华绘画，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 年 6 月出版，定价：68 元

◀《脊梁》，郭曰方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年 9 月出版，定价：49 元

两本诗集同时入选首届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优秀图书。《脊梁》中，作者用饱含深情的诗句，深刻而生动地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 100 多位科学家的人格魅力和感人事迹。《报国》则聚焦 2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诗歌和绘画的形式将科学史诗与艺术相结合，生动感人地记述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励志故事、杰出贡献，塑造了功勋科学家的崇高形象，是弘扬科学家精神、唱响时代主旋律的代表作。



《动物会做梦吗：动物的意识秘境》，[美] 戴维·培尼亚－古斯曼著，顾凡及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 年 7 月出版，定价：59 元

对于人类来说，做梦似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么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会做梦的生物吗？当动物睡着时头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研究动物的梦对于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本书作者遍查科学文献，基于来自家猫、大鼠、斑胸草雀、斑马鱼及黑猩猩等大量动物的翔实数据，证明了动物是会做梦的，许多动物在睡觉时都会进行“现实仿真”。他还将动物的做梦行为与神经科学研究和做梦的哲学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动物是有意识的生物的观点，并深入研究了由此引发的棘手的科学伦理问题，就当代关于动物认知、动物伦理和动物权利的辩论提出了见解。

本书不仅是对动物梦的生动解读，更是对其哲学与道德含义的迷人阐释。梦为了解非人类动物的认知和情感生活开启了一扇重要的大门，让我们进入非人类意识的奇异世界，转变对待动物的态度，开启美妙的探索之旅。

（喜平）